

書摘

周著「五四運動史」述要

茶陵

書名：五四運動史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著者：周策縱

出版：哈佛大學出版部

日期：一九六〇年初版

一九六七年三版

「一九五二年前後，在密西根大學的一位美國教授面前，坐着一位在密大修博士的中國留學生，他們正討論這位學生博士論文題目。那位曾經在北京住過多年的教授，忽然抬高了聲音說：『什麼！你說你要寫五四運動，不行！博士論文怎麼可以寫學生暴動？……什麼？說那是中國的文化運動，文藝復興，思想革命？簡直胡鬧。你若是堅持寫這個題目，我們就

取消你的獎學金！」這位中國學生立即憤然而去。他寫『五四運動』的決心很堅定，因為這重要的歷史題材在他腦中醞釀了已不止十年了。在經濟上和其他壓力下幾經波折，他終於完成了以『五四』為題材的博士論文。以後根據這篇論文改寫成稿，就是後來由哈佛大學出版，我們現在着手翻譯的『五四運動史』。」

這段話見於「五四運動史翻譯小組」於一九七一年一月在香港明報月刊開始發表譯本時所附的「緣起」。這個小組的成員多為出自臺灣的留美學生，他們說明合譯周策縱先生著作有兩個理由：一是因為該書本身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而且它在西方產生過相當的影響；第二，目前為止，中文著作裏還沒有一本材料豐富，態度公平，可以一窺「五四運動」全貌的書，因此他們認為要把「五四運動」介紹給現代的中國知識份子，以該書最為理想。七年以來這項翻譯工作時斷時續，迄今仍有許多篇章留待完成，譯事之難可知。國內的讀者更不易普遍獲知該書的內容，（雖然臺北的虹橋書店多年前即影印原著出版，但讀者仍屬有限）以致許多人在史料和史識兩皆不足的情況下，對這個民國以來非常重要的政治和思想運動，或空浮著無知，或充塞著誤解，這是急待匡正的現象。

「五四運動史」一書厚約五百頁，不輕易許人的胡秋原先生，讚為「中外文獻中關於這一問題最周到的一本系統著作」，與胡先生風骨相近的鄭學稼先生也感覺，「比什麼都可差的，是臺灣未曾出版似周氏著作份量的書」。為饗國內讀者，此處特依據一九六七年史丹福大學的平裝借印本，復參閱前述海外已刊的譯文，擇要摘述於後。

五四運動的定義、背景和歷史意義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故都學生示威抗議北洋政府對日的屈辱政策，由此引起一系列的罷課罷工和有關事件，造成社會的變動和思想革命，立刻學生就替這新起的潮流取名為五四運動。日後這個名詞的內涵隨時間的演進而較當時擴充，本書所說的便是就此廣義而言，其經過大體發生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年間。

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四年後凡爾賽和會做成山東決議案，激高了中國人民反抗列強的愛國



周策縱先生

情懷，學生和新思想領袖們乃升起一連串的反日活動和一項大規模的現代化運動，以求透過思想和社會的改革來建造一個新中國。他們首重西方的科學和民主觀念，而中國傳統的倫理習俗、文史哲宗教，以及社會和政治制度，都受到猛烈的抨擊。自由主義、實驗主義、功利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各種社會主義思想，則提供了猛擊的動力。五月四日的抗議發展成這一連串活動的中心點，它立即獲得新商人、工業家和城市工人的同情，北洋政府也終於被迫在內外政策上對民意讓步。它促使學生和勞工運動抬頭，國民黨改組，中共及其他政治社會團體誕生，反軍閥和反帝國主義獲得發展，新的白話文學從此確立，平民教育因而推

廣，中國的出版業和輿論也有長足進步。這運動又加速了舊家庭制度的衰微和男女平權主義的興起，孔教權威和傳統倫理觀尤其遭到基本而致命的打擊，西方的新觀念則被尊崇。

五四運動可以被定義為一種複雜現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商人罷市和工人罷工、抵制日貨以及新知識份子其他的社會與政治活動，凡此皆由二十一條要求和山東決議案後的愛國情緒所激發，並因學習西方和盼望在科學及民主的光照下，重估傳統以建設新中國的精神所致。它不是一種制式的和組織完備的運動，而是許多不同觀念的聯合活動；雖然並非沒有主流居於其間，但應視為整個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事實上，它是前個世紀西力東漸以來，中國求自適於現代寰宇的長程中，動盪而具決定性的階段之一。

何以在這段期間內適應的進行會加速？我們必須注意到一次大戰開始後，中國經濟、社會和政治的變化，以及國際對華的影響。

十九世紀西力入侵，使得中國過去以家庭和鄉村為自足單位的農業經濟開始改變，但當時中國工業擴展的機會仍少，部份原因是列強在武力或外交手段獲得的特權下，將物美價廉的工業產品傾銷於中國市場之故。直到一次大戰爆發後，外國商業競爭的壓力方告減輕，此因西方列強正以軍需製造為優先。從那時起由於入超的降低，中國的民族工商業才得以喘息和發展，若干輕工業的進步顯著，土地投資已略轉移為企業投資，新興股份公司的發展較快，部份地區的幣制統一也促進了金融活動，大城市裏開設了新式銀行，舊式的錢莊也改組跟進，而資本的集中和都市經濟的茁長，在在顯出醒目的傾向，不過此種經濟轉型仍是初步和不齊的。隨着大戰的結束，培育中國經濟活躍的國際局面旋即告終，日本對華的影響增加，其餘列強也重回中國市場，中國的雛形工業遭到巨困且顯示猛烈的沉浮，內外經濟力的利益衝突也趨於尖銳。此種經濟轉型的順序，從繁榮到危機，以至為生存而掙扎，嚴重地影響了當時每一階段的政治和文化活動。

與這些同時發生的是重要的社會變遷，此時傳統社會力的均勢聯盟大為失衡，科舉制度已於一九〇五年廢止，新而有效的人事補充制度尚未建立，青年男女頗難經由正常管道從事公職。過去家庭和鄉村的自足和合作

能補救過關，這次則因危難過鉅而非傳統方式所能濟。再者，新商人、工業家和城市工人隨着新興都市的成長而抬頭，加上內戰、瘟疫和農村經濟的衰敗，無其田的農民和失業者增加，許多人離鄉成爲職業軍人，或淪爲土匪流氓，這些不安的人口助長了軍閥主義，在五四前數年達到高速的發展。同時，一個基本上長遠的要素開始在中國社會自露鋒芒——由於地主和舊士紳的衰微，一羣具有若干現代西方知識的新人出現了。一九〇七年後十年內，約有一千萬人已受或正受各種新式教育，他們和現代西方文明的廣泛接觸，及與傳統意識和統治階層漸增的疏離，使其能領導民衆加入「救中國」的十字軍，五四運動反映了所有這些社會力的重組。

同時，一九一五年以後的國內外政治情勢，也爲革命提供一片沃土。一次大戰期間和隨後，民族主義與民主政治在全球尤其是亞洲流行，威爾遜的政治理想主義，諸如廢除秘密外交、保證小國的政治獨立和民族自決，都使中國知識份子大爲心儀。中國人的希望，又因歐洲政治的新潮、新共和國的增多、女子投票權的興起、創制複決罷免權的建立，以及工業民主而加強。但是當列強在巴黎和會上企圖重建殖民地政策時，國人由虛幻的希望跌入絕望的深淵，民族主義的情緒乃空前高漲。另一方面，此時許多國家都爆發了革命，顯示出羣衆舉事改變大局的可能性。

與這些國外革命狂潮相反的。中國人生活在黑暗的國內政局中，雖試行了前所未有的政黨政治，實際仍被軍閥所操縱。一九一四年袁世凱解散國會取消憲法，一九一五和一九一七年相繼發生了未遂的帝制及復辟運動，此後各地的實權操於互抗的督軍手中，中央大權則歸於袁的舊屬段祺瑞，段就是受日本經濟支援的軍閥官僚政治集團「安福系」的領袖。爲反對這樣的北洋政權，國父孫中山先生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在廣東成立軍政府，從此發生了許多非決定性的南北內戰。在五四事件以前，雙方在威爾遜的鼓勵下，於上海舉行過徒勞無功的和談，加之巴黎和議的起落不定，在心理上頗干擾中國人的社會情緒。辛亥革命後的那幾年，中國人的政治思想和行爲都距傳統不算太遠，大多數的人民仍苦於守舊官僚的壓迫，如舊的服從於權威、武力、傳統倫理和政治教條。這些政治上的混亂和落後更使新知識份子確信，爲使古老的中國重生，必須實行大量及基本的改革。

在中國歷史上可找到某些方面類似五四運動的事件，由學生領導批評和干政的例證不少，這種現象何以會在中國發生？乃因君主政體下沒有一個真正的立法機關或代議制度。少數受過教育的人士要表達意見既是無法避免，事實上過去的危機時期，官辦的學校往往經由師生團體，負起輿論代言人的角色。五四運動的學生們就接受了這種傳統觀念，但與前相較，本世紀的學生運動頗有異處，傳統的官辦學校與科舉制度關係密切，因此入學的成年人較多，年輕的知識份子較少，他們對政治的關心，又超過傳統的私塾學生。

五四時期的文學和思想變遷，在國史上也有類似先例。周朝後期的文字中注入了不少地方語彙，文學和思想都大有進步。唐朝有一次重要的文學改革，新的詩體和散文頗有成就，佛教的禪宗亦漸推廣。宋朝的理學在中世紀主義的對抗下也建立起來，元朝新的戲劇形式逐有發展，明朝時白話和短篇小說大為通行，清朝時古典學術的考據學興起，用以對抗理學的空虛。

雖有前例在先，五四運動的活動之廣和意義之深仍屬獨有。首先，它使中國知識份子初次注意到必須徹底變革傳統文明。當鴉片戰爭證明了西力之強，中國知識界領導人物開始醒悟有學習西方科技的必要，但仍以傳統思想制度比較高明而無須改革。到了甲午戰敗以後，中國的年輕知識份子鑑於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就，認為還當效法西方的法律和政治體制，但仍堅持中國哲學、倫理和傳統社會的基則不應改變，正如張之洞所說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歷經百日維新的失敗，以及辛亥革命未能完全實現此種體制改革，民國成立後軍閥勢力的抬頭和兩次復辟帝制運動的企圖，都證明若不從事其他的變更，則終難修成正果，於是第三階段即五四時代至焉。在此運動下的新知識份子宣稱，不但要介紹西方的科技和法政，也應將中國的哲學、倫理、自然科學、社會學說和制度徹底重驗，且參照西方的有關事物再造。

五四運動也標誌了中國知識份子對個人人權和民族獨立觀念的迅速覺醒，它在思想和行動中團結民衆，加快了中國「民族國家」型態之統一，這是具有世界性意義的。進而言之，由於此運動在經濟、社會、政治和思想各領域，都介紹或同意了許多新因素，所以它成為瞭解數十年來中國的首要關鍵。由於隨後的多數論戰和關

爭都因該運動觸發，當今中國的政局，也可說是直接或間接本此運動發展的結果，可知五四的餘波並未消失，它持續到現在，或將指向未來。近代中國的大多數領袖，（譯者按：本書截於五十年代）從文學哲學到經濟政治各界，都受過五四時期的教育和訓練，並因加入此運動才展開他們一生的事業，這經驗也一直影響他們的思路和心。雖然有許多保守派把中國後來的災禍全都歸罪於五四，但年輕一代却頗思及五四的深恩。因此可以合理的斷言，除非明白五四運動的主流，否則絕難充分瞭解現代中國的特質。

當我們評論西方與中國的關係時，更不能忽略此運動。在這期間對中國傳統倫理、習俗和制度最大的挑戰，就是以自由主義、民主和科學等觀念出現的西方思想。然而在後來那幾年，西化的重點由自由主義轉為社會主義，似乎可以下列因素解釋：中國需要快速的工業化、她屢遭屈辱的戰敗、她有權威型的政治遺風，以及對一個基於合作而非個人主義的社會，社會主義的理想具有吸引力等。另一方面，西方列強為爭取在華經濟利益而採用可恨的帝國主義手法，加上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誤導政策和欠缺效率，都證明了西方文明的缺陷。此外研討西方各國對五四運動的政策和態度，也有助於瞭解其起落。

促進五四運動的力量（一九一五—一九一八）

為求明白五四運動的情思，必須探討中國人有關日本對華政策的反應，以及一次大戰期間中國留學生的活動。前者表達了中國民意並形成運動主力的，大致上有不同兩派：一派包括讀書人和白丁，他們對帝國主義的反應強烈，充滿救國的熱忱，供給五四運動感情上的動力；另一派主要是年輕的知識份子，他們受了西方文化衝擊的影響，提議各種改革以達國家現代化，賦予五四運動思想上的內容。

關於後者，當時中國留學生人數激增，他們和西方的密切接觸帶來了新觀念，又藉此啟發協助其他新知識

份子促成了五四運動。

中國人在清末不外以「富國強兵」爲己任，到了五四時期却明白當務之急是把中國從列強的壓制下救出，他們團結的口號是「救國」。此初現於甲午戰敗後，五四時更廣泛流行，反映出國人，特別是知識份子，對中國在當世掙扎求生中遇見的危機已有所警醒，日本的二十一條要求招來的恥辱和其後發生的事件，更加速了這種警醒。

二十一條要求實際上圖謀控制東北、內蒙、山東、中國東南沿海和長江流域各地，中國接受的結果便是上列都將淪爲日本的殖民地，整個國家的經濟和行政也將被控制。其中第五項更意圖完全剝奪中國政府的對內控制權，規定在政經軍事上都必須僱用有影響力的日籍顧問，重要城市的警察須由中日合組與管理，所需軍器的半數以上要購用日產，或准許在中國境內建立合辦的兵工廠等。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提出最後通牒，要中國不加修改地接受一至四項的全部以及五項內有關福建的要求，袁世凱政府終於五月九日表示同意。

當談判還在進行時，中國各地民情激昂，所有輿論都強烈反日，新知識份子代表國民抒發對「國恥」觀感的聲音遍及中華，留美學生聞訊也極興奮。民衆憤怒的高峯是在袁政府接受要求後，牆壁、商品商標和信紙信封上，到處可見「毋忘國恥」的標語，五七和五九迅被命名爲「國恥紀念日」，蒙受國恥的經過也寫入了教科書。

中國的官民對二十一條的反應不同。有些官吏立刻提出一個救國計畫，並得到袁世凱的認可，但不久便遭遺置。民衆則認爲必須注意兩大影響：首先是新的民族主義逐漸形成，不少人覺悟國人如欲生存便須抵抗外侮，五四運動的兩大口號之一——「外抗強權」，就是由原先的「外爭國權」改成。其次是由於國外侵略的壓力，使全國至少在當時有團結一致的精神。但袁世凱圖謀帝制的野心終於暴露，警告了國人尤其是新知識份子：要救中國必須剷除所有的軍閥和賣國者。這個觀念漸行漸強，後來便產生五四期間另一最流行的口號——「內除國賊」。

二十一條提出以後，中國境內甚至海外的舊金山，華人都展開抵制日貨運動，這正發生在一次大戰期間國際貿易失調之時，民族工業受此刺激而迅速生長，所以也成為幫助當時中國工業發展的一個要素，多種輕工業的生產都有顯著增加。雖然如此，國人對經濟建設的努力仍是初步和不全的，當時的危機也未能使國人完全頓改傳統性對國事的冷漠態度。不過，少數活躍的知識份子，特別是回國或仍在外的留學生，他們比過去更曉悟到中國的基本難題何在，於是開始思考是否須對傳統文明做一番徹底的變革。

五四的新思想和新行動與歸國留學生時有關聯。上世紀和本世紀交替期間，中國留學生多到美國、日本和法國求學，因此這三國成為外國影響力的中心，在中國都重印了它們各自的文化模式和政治社會信仰，從留學生對國事提出的不同甚至相反的答案，便可看到這三國文化上的異處，五四運動反映出這些差別的影響。

美國是近代中國派遣留學生所到的第一個國家，一九〇九年美國政府開始退還庚款以助中國學生留美，一九一五年便有一千二百人在美就讀大專。同年日本對華要求的新聞極度刺激了這些學生，他們在「中國留美學生日刊」裏熱烈發言。有些學生說中國應該仿效比利時的抵抗，而不應像朝鮮一樣被征服；有些主張各人面對國內危機，要放棄原定的前途計畫，回國做重大的犧牲；有些甚至願意利用暑假到美國軍部主辦的營地受訓。但此時有少數人呼籲大家冷靜。胡適時任該刊的國內通訊版編輯，他寫了一封「給全體中國同學的公開信」，請求採取「清醒的愛國主義」，不要被「報章的喧囂」引導離開大家最重要的任務——讀書。這封信引起了劇辯，胡適被同學們罵成「賣國賊」，月刊的總編輯鄭照堃撰一長文答覆胡適，結論認為胡所提出的是「不愛國的瘋言亂語」。另一留學生則在投書中指出，只有認真研究國家危機的學生，才能真正盡他的責任——解決急務的責任。

這個辯論接觸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它牽涉到新知識份子五四運動中的活動方式，和往後某些程度的中國教育、政治和社會發展方向。胡適認為中國問題的解決辦法是教育，這比建軍更要深刻和根本，是由底層做起，正如他在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日記中所說：「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陸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

、無公共藏書樓、無博物院、無美術館，乃可恥耳。我國人其洗此恥哉！」教育救國這觀念，過去自有倡者，五四時期胡適和其他受美國影響的新知識界領袖們則將它付諸實行。

同時另有一個影響長遠的運動也開始成形。上世紀末中國文學家們業已討論到「文學革命」，但是並無具體計畫可供發展。一九一五年胡適提到的文學革命初也只是詩歌革命，「要使作詩如作文」而已，根據他的說法，文學革命的廣義就是在所有文學作品中以白話取代文言，但這是翌年與同學討論時才形成的觀點。一九一六年十月他 信給國內的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登出他的「八不主義」，一九一七年一月該刊又發表他的「文學改良芻議」，陳則在次月發表強烈的「文學革命論」以為聲援，至此討論者衆。一九一九年胡適回憶時表示，新詩革命的觀念主要是本於自己的實驗主義和文學進化論，這些理論是從中國文學史和歐洲文藝復興得來的教訓，也該注意的是他或亦受到本世紀二十年代美國文學運動的影響。彼時不僅是美國詩的新紀元，也是美國文學和思想上的新紀元。一位美國歷史學家說：「這是美國的文藝復興時代，龐德指出相形之下，義大利的文藝復興不過是茶杯裏的風波而已。這是一個凡事皆新的時代，新女性、新人文主義、新藝術、新民族主義、新自由，甚至如羅賓遜和比爾德的所謂新歷史。」胡適和其他五四文教改革的領袖們，便是在這個創造啟發的時代留美，這種類似的精神在五四期間也為中國溶滙了一個新紀元。

在哲學、教育理論和科學方法等領域，中國新知識份子同樣也受了留美歸國學生的引導。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冊便是章炳麟以後對中國哲學和邏輯重估的先驅之作，本書是根據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由杜威指導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杜威的實用主義和教育哲學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有突出影響，那是他學生胡適、蔣夢麟、陶知行、鄭曉滄的努力和他親自來華講學的結果。杜威夫婦於五四事件爆發前三天抵達上海，兩年多後離華，他的講稿和文章在中國新知識界流傳甚廣。

中國留日學生的傾向不同於留美。從一九〇三年開始包括五四時期，中國留學生以留日者佔最多，其中不少成為五四運動的領袖，他們供應了運動中主要的激烈因素，以及新文學作家中的許多領導人物，革命極端份

子如民族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反對五四運動的軍事與民政官吏，也有不少是留日學生。

留學生從日本帶來的影響主要有三：(一)到日本學習軍事者回國後，是反對五四運動的中堅份子，這是由於日本軍事訓練導致的自然結果。東瀛的軍校紀律森嚴，學生奉長官如神明，他們不能批評學校行政人員，也不能干預政府策略，這和五四新知識份子視此為學生及一般青年的道德責任者正好相反。(二)五四期間新文學的創作，也要歸功於回國的留日學生。當時國人能够讀到的西方作品，多半是從日文轉譯而來，成為現代中國文學在技巧和主題上摹仿的對象。日本對當時中國新文學的風格影響亦著，五四初期作家中仍然流行的「梁啟超體」就有日文的痕跡，居領導地位的作家如周氏兄弟也都是留日的。(三)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亦由日文輸入，這兩種思想在五卅時流行於中國青年中。從一九〇二到一九一一年，君主立憲的保皇黨和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都曾在某種程度上宣傳社會主義，前者的代表人物自是梁啟超，後者包括朱執信等。

留日學生對二十一條的反應與留美學生迥異，約有四千名以上的中國青年在聞訊後立刻集體離日返國，以示最強烈的抗議。留日學生對中日關係特別敏感也特易動情，因為在地理上他們接近祖國，客居在日本的環境下，個人不愉快的感受同時也很容易化為國仇。一九〇五年為了抗議日本文部省宣布的「清朝留學生取締規則」，全體留日學生罷課，陳天華更蹈海自殺。一九一一年為參加辛亥革命，一九一五年為抗議二十一條，一九一八年為抗議中日軍事互助協定，先後都有留日學生集體回國。

一九〇五年的事件產生了若干當時不能預見的結果，對五四運動有間接的影響。那次回國的學生數約一千，翌年他們在怒潮下成立了上海中國公學，內有不少學生（如胡適、朱經農、任鴻雋）後來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要角，這所學校亦屬當時新學最先進的中心之一。一九〇六年留日歸國生還組織一個「各省旅滬學生總會」，它可說是現代中國學生大聯合的創始，宗旨是「為他日敷設國會之權輿」，公約有三：「尚公德、惜名譽、重實踐」。這個總會不久便消聲匿跡，但畢竟是首次成立的全國性組織，首次留心中國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問題，也可說是五四事件後各種熱心活躍的學生團體之序曲。根據它的「第一次簡章」，得知他們早就想提倡白

話和國語。

一九一五年留日學生的集體回國，政治性和外交性都要濃厚於前，而且激起了強烈的民族主義和反日情緒。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二日的回國事件，對九天後在京發生的學生遊行請願頗生影響，同時也協助了日後若干政黨團體的組成。到一次大戰後期，國民黨領袖將民族主義的熱情在留日學生和知識份子中激發起來——一九一三年許多國民黨人因二次革命流亡日本，次年孫中山先生在東京改組它為革命性政黨，於大戰期間鼓吹反對北洋軍閥政府，大戰末期再次倡議民國成立後幾已放棄的民族主義。

二十世紀以來，法國革命的政治思想風行於中國革命青年與維新派之間，到一九二〇年它已影響了為數甚夥的知識份子和政治領袖，如梁啟超、陳獨秀和許多國民黨領導人物。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就發表了「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宣稱法國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創始者。陳的文學革命理論，實在也是他研究法國文學史的結果。後來還有人將五四運動比做中國的「法國啟蒙革命」。

五四知識份子受到十八、十九世紀法國民主思想和自由主義的巨大影響，他們的氣質時常流露出法國浪漫主義的痕跡，法國烏托邦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理論也傳入中國。一九一五年六月，李石曾、吳稚暉、蔡元培等無政府主義者在巴黎組織了勤工儉學會，旨在鼓勵和幫助窮學生在法工讀，一九一九年尾勤工儉學生已達四百人，次年增加了三倍，他們事實上只有較少數進了學校，大半受雇於工廠等地。

大戰時期中法之間還發展了一項無前例的移民協定。一九一六年初英法政府招募中國工人赴歐洲等處工作，到五四事件之前，公布的人數已達二十萬。這些工人很明顯地和其他華僑的性質不同，他們當中有知識份子，但是幾乎每個人都要幹粗活，而且只是暫時在外，預定戰爭結束即回中國，根據合約也有權組織工會。華工到西方工作，對中國日後的羣衆運動有重大影響，最主要的是使知識份子有機會和工人共同生活，並負起領導責任。這些「學生工人」都出身中下家庭，他們首次大規模地打破了屬於有閒階級的留學生傳統。在學生的協助下，留法的華工組織了許多工業性和社會性機構，如職業介紹所和華人協會等，後者在幫助改善學生和工人

的教育及福利。一九一六年以後，教育留法工人的工作就多半由國際基督教青年會主持，職員如蔣廷黻等，是來自美國大學的志願者。曾在青年會工作的晏陽初，一九一八年也利用在法教育工人的經驗，去推行那於五四後期變為風行的平民教育運動。同時，由於工作的社會環境之影響，留法的華工和「學生工人」對於種族和階級觀念，也逐漸發展出他們自己的態度，到了戰爭結束時，他們當中的領袖分別已有信奉民族主義、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斯主義的。戰後歸國的他們也帶回了新經驗和新思想，許多工人學會讀寫和體認到西方較高的生活程度，又接觸過當時歐洲的勞工運動，民族意識變得非常強烈，不少人在歸途中因為山東問題而拒絕登岸日本港口。他們的經驗對五四時期上海的工會組織與活動都有助益，一九二〇年秋天前就有人說：「和歐洲最近的關爭接觸而同國的工人，是中國工運的發難者。」平心而論，這些工讀生和工人中確有相當人數，是在二十年代將五四運動推向極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要角。

中日衝突就這樣激起了國人的民族主義熱情，留學生則提供了許多汲自西方的新思想，他們回國後就開始領導正在形成中的大改革。

作家日記

張伯權譯

定價四〇元

函購九折

杜思陀也夫斯基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已是五十三歲的人，他一共活了六十一年，日記也就寫到他逝世的那一年。「作家日記」免不了具有相當的自傳性質，就此意義，與托爾斯泰的「懺悔錄」，歌德的自傳「詩與真實」相近。對於生活中那些「無助而又無望」的人，杜氏永遠毫無遲疑地伸出援手；對那些被壓迫的馴良的人，隨時準備給予比血還濃的兄弟之情。

■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